

限制捐赠资产使用会使慈善组织获得更多的捐赠吗？

黄虹, 李晓颖, 贺宇倩, 刘江会, 申强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捐赠者作为慈善资源的委托方, 在推动慈善组织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然而目前文献对于其如何发挥治理行为还未有定论。利用中国慈善基金会 2011—2020 年的数据, 研究慈善捐赠者主动治理行为对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 捐赠者的主动治理行为能够增加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 但两者呈现倒 U 型关系, 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是其发挥主动治理效应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上述治理效应与慈善组织的内、外部治理存在替代作用。在进一步划分捐赠收入类型以及慈善基金会规模后, 本文发现捐赠者主动治理效应在大型基金会以及对机构捐赠收入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体现了捐赠者主动治理的积极作用, 为提升我国慈善组织筹款能力、促进公益慈善高质量发展、完善第三次分配体系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 慈善组织; 主动治理; 第三次分配; 限定性净资产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4)04-0102-10

Will restricting the use of donated assets enable charities to receive more donations?

HUANG Hong, LI Xiaoying, HE Yuqian, LIU Jianghui, SHEN Qia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role of benefactors as trustees of charitable resources, they play a crucial role in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However, there is currently no consensus in the literature on how they perform governance actions.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charity foundation from 2011 to 2020, we study the impact of governance effects of donors on the future donation income of the found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e governance effect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uture donation income in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and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effect.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above effects have substitution roles wi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foundation. After further dividing the types of donation income and the scale of charitable foundations, we find the effect has a more obvious impact on the donation income of large foundations, and donors are governed out of the preference of improving social welfare and their own social value.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indicate the active governance of donors, and provide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fundraising abilit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welfare charity, and improving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ystem.

Key words: charity; active management; third distribution; restricted net assets

收稿日期: 2023-10-20 修回日期: 2024-03-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173087)。

作者简介: 黄虹(1967—), 女, 上海人, 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通信作者: 贺宇倩。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中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慈善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十四五”规划再次强调了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作用,并且明确指出了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推进共同富裕、提升文明程度、促进和谐善治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国慈善组织的规模与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在优化资源配置与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显示,截至2020年登记在册的基金会共8432个,近5年增加了2873家,增长率达到51.68%。然而,伴随着慈善组织的快速发展,一些涉及“善款”来源和去向的负面新闻也逐渐浮现^[2],一系列丑闻事件在引爆社会信任危机的同时,也对慈善组织的良性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慈善组织对捐赠者存在受托责任,但现实中捐赠者却难以获知慈善资源是否得到妥善分配^[3]。有学者将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慈善组织的“不透明”,也即慈善组织与捐赠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如此,慈善组织管理层出于私利而浪费慈善资源的行为不在少数,这进一步加剧了代理问题。如何运用有效手段改善慈善组织与捐赠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针对上述问题,以往文献大多从慈善资源的受托方——慈善组织的治理角度展开分析,如外部审计监督^[3]、社会化基金治理^[4]、社会网络等^[5]。然而,上述研究关注到的大多是慈善组织内部的治理改善,抑或是第三方发挥的外部治理作用,鲜有文献涉及慈善资源的委托方——慈善捐赠者的治理作用。不仅如此,目前有关慈善捐赠者的文献大多关注于捐赠者的慈善偏好^[6],并没有直接回答捐赠者是否进行主动治理,其主动治理的动机与方式是什么,以及是否可以将其作为其他治理方式的补充或替代等问题。

近年来,有关慈善捐赠者行为对慈善组织影响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其中尤以捐赠者“限制捐

赠”行为的分析居多。所谓“限制捐赠”行为,指的是捐赠者对其所捐赠资产施加了某种“限制”,主要包括时间以及用途的限制。时间限制要求资源只能在特定时间内或规定的日期之后使用,用途限制要求资源用于特定目的。由于这类“限制”规定了资产的去向,可以视为捐赠者对慈善组织的主动治理行为。限制捐赠所形成的捐赠资产在慈善组织账目上具体体现为限定性净资产,限定性净资产占总净资产比例越高,捐赠者限制捐赠行为越明显,主动治理效应也更突出。Hung^[7]证明了捐赠者限制捐赠的能力与组织接受捐赠的金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Surysekar等^[8]发现限定性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与未来捐赠收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上述研究证实了限制捐赠行为会显著影响慈善组织,但并未从捐赠者主动治理角度深入分析。目前海外对于慈善捐赠者主动治理的行为,从立法的角度进行了相应的支持与保护,并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慈善组织职责的发挥,并促进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9]。如美国社会通常将限制捐赠视为慈善机构和捐赠者之间的一种合同,并要求慈善机构恪守承诺并确保捐赠用于合适的目的。限制捐赠可以采用各种形式(包括对特定项目、计划或资金的指定),政府则通过税收政策(如针对限制捐赠的税收豁免)和监管(IRS规定)来监督和促使慈善机构履行这些义务。然而,目前国内文献除了在控制变量上有所提及之外^[10],还未有限制捐赠行为与慈善组织关系的深入研究。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颁布,税收优惠政策从对突发性捐赠的重点扶持,转而向持续性的大额捐赠倾斜^[11]。在此背景下,基于避税动机的限制捐赠行为显著减少,而出于治理动机的限制捐赠行为则大大增加。综上所述,基于中国特殊的政策背景,以及中外慈善组织在组织架构、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12],进行基于中国样本的慈善捐赠者限制捐赠行为与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影响的专门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慈善组织2011—2020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捐赠者对其捐

赠的资产施加限制是否能够对慈善组织发挥治理效应。具体来说,本文使用慈善组织年度报告中,其限定性净资产占总净资产的比例来衡量捐赠者对慈善组织的主动治理行为,以此考察了上述限制捐赠行为是否能够改善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并以此增加其未来捐赠收入。本文的研究结论发现,捐赠者的主动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并增加慈善组织的未来捐赠收入,但当主动治理超出一定范围后,慈善组织的未来捐赠收入不升反降。也就是说,捐赠者的主动治理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正向作用,但其对慈善组织如何使用捐赠资产的限制过多也可能会间接引发外界对慈善组织的担忧,并且影响慈善组织的正常运营,从而减少慈善组织未来获得捐赠的可能。除此之外,本文发现上述的治理效应与慈善组织的内、外部治理存在替代作用。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提供了除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第三方外部治理以外,慈善资源的委托方——慈善捐赠者主动治理的实证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捐赠者将慈善资源捐赠给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成为慈善资源的受托人,捐赠者则是慈善资源的委托人。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慈善组织的经营者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浪费资源,加剧代理问题。基于上述原因,捐赠者可以通过对捐赠的资产施加限制的方式,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从而发挥主动治理的作用。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逻辑,在一定范围内对捐赠资产的限制越多,代表捐赠者对慈善组织发挥的主动治理效应越明显。然而,由于捐赠者往往不具备慈善组织运营的专业能力,在主动治理动机下,捐赠者针对慈善组织如何使用捐赠资产的限制行为超过最优契约下设定的约束后,经营者的利益与慈善组织的有效性可能受到损害(提供服务、筹资和支付运营费用的能力)。一方面,慈善组织很难最大效率分配慈善资源,从而影响慈善项目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过多的主动治理行为也可能令其他捐赠者对慈善组织是否能够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导致未来捐款的

减少。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1:慈善捐赠者主动治理行为与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呈倒 U 型关系。

区别于营利性组织,捐赠者作为慈善组织的资源提供者,却并不是该项资源的直接受益者,也很难通过正常的收益法则评估慈善组织的资源配置质量。而慈善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赠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捐赠收入,其有内在动力吸引更多的捐赠者。已有研究发现,会计信息是捐赠者与监管部门获取慈善组织信息的重要来源,因其重要性,慈善组织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也会显著影响其未来的捐赠收入^[3]。由于捐赠者进行的主动治理行为大多源于其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为了缓解相关限制带来的不利,当面临捐赠者的主动治理行为时,慈善组织会更致力于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积极建设社会公信力,以此提升其未来可获得的捐赠收入。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2:信息披露质量在慈善捐赠者主动治理行为与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的影响机制中具有中介效应。

已有研究证实,不同治理结构的慈善组织,以及不同程度的外部治理水平,均会通过相应的治理效应改善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最终影响到慈善组织的未来捐赠收入^[4]。而当一种治理机制缺失时,另一种治理机制将发挥更为关键的治理效果。相对于传统的内外部治理机制,捐赠者的主动治理行为能够起到重要的替代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 H3:慈善捐赠者的主动治理与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外部(第三方)治理的效应发挥存在替代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变量设计

本文选取了 2011—2020 年的中国慈善组织的面板数据,要求每个慈善组织必须包含连续两年的数据,财务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的中国非营利组织数据库(CNGO),同时手工整理了慈善组织官网披露的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工作报告中的相关数据。中基透明指数(FTI)来自基金会中心网 FTI 2019 年、2020 年榜单以及 2018 年《FTI 发展研究报告》。对 $Res_{i,t-1}$ 做

Winsorize 处理并去除小于 0 和大于 1 的样本,最终样本共计 11 840 个。利用 stata 16.0 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Donations_t$	捐赠收入	捐赠收入取对数
	$Donations_GR_t$	个人捐赠收入	境内外自然人捐赠收入取对数
	$Donations_JG_t$	机构捐赠收入	境内外机构捐赠收入取对数
解释变量	Res_{t-1}	主动治理程度	即捐赠资产限制程度,以限定性净资产占总净资产的比值来衡量
中介变量	FTI_t	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FTI)	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取对数
控制变量	FR_{t-1}	融资效率	筹资费用占捐赠收入的比值
	$Fundraising_{t-1}$	筹资比率	筹资费用占总费用的比值
	$Prog_{t-1}$	业务活动成本率	业务活动成本占总费用的比值
	$Concentration_{t-1}$	收入集中度	每一种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的平方之和,收入来源包括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汇兑损益以及其他收入。结果取对数。
	Age_t	成立年限	基金会成立的年限
	Off	募集方式	基金会募集方式,公募取 1,非公募取 0
	Ind	行业	基金会关注领域为教育助学类取 1,非教育助学类取 0
	$Area$	注册地	基金会注册地为发达地区取 1,非发达地区取 0
	$Size$	基金会规模	基金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Gender$	理事长性别	基金会理事长的年龄大小
$Personage$	理事长年龄	基金会理事长的性别,男性取 1,女性取 0	

1. 被解释变量

捐赠收入($Donations_t$):慈善组织业务活动表收入栏下的捐赠收入取对数来表示;个人捐赠收入($Donations_GR_t$):境内外自然人捐赠收入取对数;机构捐赠收入($Donations_JG_t$):境内外机构捐赠收入取对数。

2. 解释变量

主动治理程度(Res_{t-1}):也即捐赠者向慈善组织的捐赠资产限制程度,其具体定义为慈善组织年报中,限定性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由于我国慈善组织审计报告规定披露的是限定性净资产与非限定性净资产,因此本文将捐赠资产限制定义为限定性净资产占总净资产的比重。

3. 中介变量

信息披露质量(FTI_t)。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FTI)的评价指标分为合规性指标和倡导性指标。合规性指标包括慈善组织章程、基本报告情况(年

度工作报告、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告等)、治理情况、项目设立情况等;倡导性指标包括基本信息、评估认证情况和资助项目情况。这个指标可以反映会计信息的披露是否真实可靠,参考以往文献,本文使用 FTI 指数作为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

(二) 模型设计

本文假设捐赠者主动治理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促进慈善组织的未来捐赠收入,但超过一定范围将因为财务限制等原因损害其未来捐赠收入。由上述假设可知,捐赠者主动治理行为与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两者的关系,在实证检验中大致会呈现出倒 U 型关系。因此,本文选取 Surysekar 等^[8]的模型,通过在模型中加入二次项系数,检验二次项系数的正负性和统计显著性,以确定倒 U 型关系是否存在。据此,假设 1 的模型可以设定为:

$$Donations_t = \alpha_0 + \alpha_1 Res_{t-1} + \alpha_2 FR_{t-1} + \alpha_3 Prog_{t-1} + \alpha_4 Fundrasing_{t-1} + \alpha_5 Concentration_{t-1} + \alpha_6 Age_t + \alpha_7 off + \alpha_8 Ind + \alpha_9 Area + \alpha_{10} Gender_t + \alpha_{11} Personage_t + \varepsilon_t \quad (1)$$

$$Donations_t = \alpha_0 + \alpha_1 Res_{t-1} + \alpha_2 Res_{t-1}^2 + \alpha_3 Prog_{t-1} + \alpha_4 Prog_{t-1} + \alpha_5 Fundrasing_{t-1} + \alpha_6 Concentration_{t-1} + \alpha_7 Age_t + \alpha_8 off + \alpha_9 Ind + \alpha_{10} Area + \alpha_{11} Gender_t + \alpha_{12} Personage_t + \varepsilon_t \quad (2)$$

模型(1)与模型(2)分别为线性模型和二次模型。模型(2)加入二次项用来检验假设 1 的倒 U 型关系。如果 Res_{t-1} 的系数为正, Res_{t-1}^2 的系数为负,则说明假设 1 成立。

为更好地检验是否存在中介变量影响本文的主要结果,参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温忠麟等^[13]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据此提出假设 2 的模型为:

$$FTI_t = \alpha_0 + \alpha_1 Res_{t-1} + \alpha_2 FR_{t-1} + \alpha_3 Prog_{t-1} + \alpha_4 Fundrasing_{t-1} + \alpha_5 Concentration_{t-1} + \alpha_6 Age_t + \alpha_7 off + \alpha_8 Ind + \alpha_9 Area + \alpha_{10} Gender_t + \alpha_{11} Personage_t + \varepsilon_t \quad (3)$$

$$FTI_t = \alpha_0 + \alpha_1 Res_{t-1} + \alpha_2 Res_{t-1}^2 + \alpha_3 FR_{t-1} + \alpha_4 Prog_{t-1} + \alpha_5 Fundrasing_{t-1} + \alpha_6 Concentration_{t-1} +$$

$$\alpha_7 Age_t + \alpha_8 off + \alpha_9 Ind + \alpha_{10} Area + \alpha_{11} Gender_t + \alpha_{12} Personage_t + \varepsilon_t \quad (4)$$

$$Donations_t = \alpha_0 + \alpha_1 Res_{t-1} + \alpha_2 FTI_t + \alpha_3 FR_{t-1} + \alpha_4 Prog_{t-1} + \alpha_5 Fundraising_{t-1} + \alpha_6 Concentration_{t-1} + \alpha_7 Age_t + \alpha_8 off + \alpha_9 Ind + \alpha_{10} Area + \alpha_{11} Gender_t + \alpha_{12} Personage_t + \varepsilon_t \quad (5)$$

模型(3)与模型(4)用于检验捐赠者主动治理程度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如果 Res_{t-1} 的系数显著,说明中介路径的第二步成立。模型(5)用于检验信息披露质量是否影响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如果 FTI_t 仍然显著,则说明中介路径的第三步也成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从表中可以看出,机构投资者捐赠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捐赠。主动治理程度的平均值为24.1%,中位数为0,对慈善组织的净资产施加使用限制和时间限制的金额占总净资产的金额不大。平均而言,业务活动成本率占总费用的88.1%,说明业务活动成本占慈善组织费用的很大部分。50.1%的慈善组织为教育助学类基金会;36.5%的基金会募集方式为公募,63.5%的慈善组织募集方式为私募。表3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初步说明了捐赠者主动治理程度与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存在

表2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Std. Dev	min	max	P25	P50	P75	N
Donations	11.83	5.930	0	19.64	11.55	14.02	15.54	11 840
Donations_GR	7.150	6.736	0	17.98	0	9.359	13.46	11 269
Donations_JG	9.016	7.241	0	19.57	0	12.77	15.01	11 270
Res	0.241	0.356	0	1.064	0	0	0.462	11 840
Cost of FR	0.002	0.021	-0.078	0.144	0	0	4.39	11 840
Fundraising	0.003	0.023	-0.066	0.160	0	0	0.160	11 840
Prog	0.881	0.230	0	1.043	0.906	0.955	1.043	11 840
Concentration	-0.189	0.258	-1.029	0	-0.303	-0.051	0	11 840
Ind	0.501	0.500	0	1	0	1	1	11 840
Age	8.085	7.386	1	32	3	6	32	11 840
Off	0.365	0.481	0	1	0	0	1	11 840
Size	15.97	1.493	10.85	20.37	14.92	15.79	20.37	11 840
Gender	0.787	0.410	0	1	1	1	1	11 840
Personage	51.31	10.29	29	78	44	51	78	11 840

表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Donations	Res	Res ²	FR	Fundraising	Prog	Concentration
Donations	1	-	-	-	-	-	-
Res	0.127***	1.000	-	-	-	-	-
Res ²	0.071***	0.971***	1.000	-	-	-	-
FR	0.007	0.006	-0.006	1.000	-	-	-
Fundraising	0.024***	0.010	0.011	0.634***	1.000	-	-
Prog	0.192***	0.060***	0.035***	-0.108	-0.254***	1.000	-
Concentration	-0.027***	-0.009	0.008	-0.098***	-0.036***	-0.057***	1.000

一定的正向影响,业务活动成本率、收入集中度与未来捐赠收入正相关。

(二) 实证结果分析

1. 主回归分析

从表4中OLS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线性模型中,慈善组织所获得的未来捐赠收入随着捐赠者主动治理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即主动治理程度与捐赠收入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然而二次模型显示,到了某个点,捐赠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通过计算主动治理程度的偏导数得出,当比例小于47.4%时,慈善组织的未来捐赠收入是随着该比例的提高而逐步上升的,等于该值时捐赠收入达到最大。但当此比例超过47.4%时,未来捐赠收入开始随之下降, Res_{t-1} 的斜率变为负数,如图1所示。 Res_{t-1}^2 的负系数表明,对所获得的捐赠资产的高水平的限制阻碍了管理者的执行能力,可能导致慈善组织无法履行其使命,进而影响其正常运行,从而导致其未来的捐赠

表4 主回归分析

变量	(1)	(2)
	$Donations_t$	$Donations_t$
Res_{t-1}	0.935*** (6.717)	6.486*** (13.768)
Res_{t-1}^2	-	-6.164*** (-11.934)
FR_{t-1}	-4.194 (-1.229)	-3.805 (-1.144)
$Fundraising_{t-1}$	13.199*** (4.450)	12.796*** (4.384)
$Prog_{t-1}$	2.911*** (9.471)	2.797*** (9.153)
$Concentration_{t-1}$	2.600*** (14.867)	2.554*** (14.740)
Ind	0.745*** (7.658)	0.664*** (6.956)
Age_t	0.018** (2.468)	0.017** (2.353)
Off	0.187 (1.645)	0.080 (0.719)
$Area$	0.154 (1.526)	0.147 (1.482)
$Size$	0.923*** (23.334)	0.872*** (21.777)
$Gender$	-0.036 (-0.381)	-0.031 (-0.331)
$Personage$	-0.011*** (-2.588)	-0.012*** (-2.943)
Year FE	控制	控制
$_Cons$	-3.717*** (-3.949)	-2.666*** (-2.775)
Obs	11 840	11 840
Adj. R ²	0.169	0.182

注:括号内为t值; **和***分别表示在 $p < 0.05$ 、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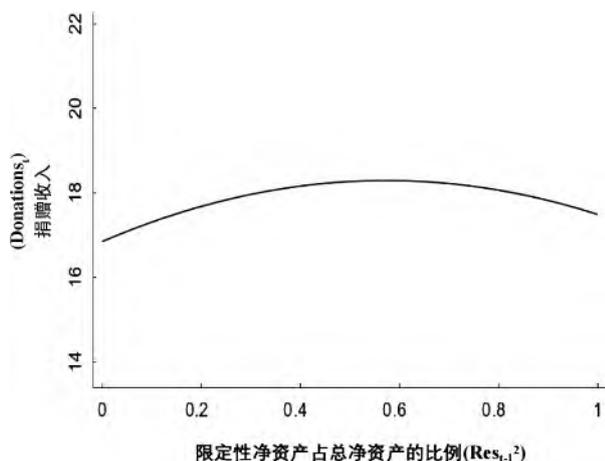


图1 主动治理程度与捐赠收入的倒U型关系

收入减少。当捐赠者对其捐赠资产有严格偏好而施加限制较多时,慈善组织不得不承担这些计划以外的费用,但是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抵消这些费用。倘若不这样做,基金会将面临失去未来捐款的风险,因为潜在的和现有的捐赠者会认为基金会的管理已经变得低效,从而减少其捐款。

控制变量上,业务活动成本率与未来的捐赠呈正相关关系。业务活动成本率反映了慈善组织的费用中用于完成公益和慈善项目的部分,广泛用作衡量非营利组织效率的指标。用于项目服务以外的费用的资金比例越高,就认为该基金会的效率越低。捐赠者似乎更愿意捐赠给那些将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促进慈善机构使命的慈善机构,而将较小比例的收入用于行政或筹款活动。结果表明,慈善组织在项目上的支出越多,未来收到的捐款就会增加越多。收入集中度越高,基金会收到的未来捐赠也越多。基金会成立年限和基金会规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基金会的声誉,基金会声誉越好,未来捐赠收入也越多。

2. 中介效应检验

将 Res_{t-1} 的范围设定在(0, 47.4%)之间,表5的Panel A中的第(1)列~第(3)列分别为按照模型(3)~模型(5)进行回归的结果,表5的Panel A的第(1)列显示,主动治理程度(Res_{t-1})的系数为0.457,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而第(2)列中主动治理程度的二次项(Res_{t-1}^2)不显著。因此,本文

通过进行 Bootstrap 检验获取置信区间,选取 95% 的置信水平并重新抽样 1 000 次,结果如表 5 的 Panel B 所示,中介变量信息披露质量(FTI_t)回归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成立。采用信息披露质量对捐赠者主动治理与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以解释为,捐赠者出于对基金会的不信任而对其捐赠的资产的使用施加限制。而慈善组织报告的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代表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的提升,慈善组织为了消除捐赠者的不信任,致力于提高其工作报告、审计报告或者年检报告的信息披露质量,捐赠者通过分析其披露反映出的真实完整的信息,加强了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从而更愿意给予慈善组织捐赠。此外,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慈善组织与其他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会使其他潜在的捐赠者更愿意捐赠信息披露质量高的慈善组织。本文的假设 2 成立。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Panel A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FTI_t	FTI_t	$Donations_t$			
Res_{t-1}	0.984 *** (4.580)	1.893 *** (2.717)	2.162 *** (3.657)			
Res_{t-1}^2	-	-2.064 (-1.372)	-			
FTI_t	-	-	0.826 *** (5.847)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3.635 *** (13.613)	3.659 *** (13.690)	9.927 *** (11.367)			
Obs	381	381	371			
Adj. R ²	0.248	0.250	0.358			
Panel B Bootstrap 检验中介效应						
	Observed Coef.	Bootstrap Std. Err.	z	P > z	Normal-based [95% Conf. Interval]	
bs_1	0.146	0.070	2.100	0.036	0.010	0.282
bs_2	1.112	0.214	5.190	0.000	0.692	1.532

注:括号内的为t值,***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bs_1 表示直接效应,bs_2 表示间接效应。

3. 主动治理效应的替代作用检验

本文分别使用基金会性质、基金会评级以及基金会所聘请的审计事务所性质来衡量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程度。其中,基金会性质指的是慈善

基金会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基金会,一般来说,全国性基金会的组织结构更复杂,其所受到的社会监督力度也会更强。而基金会评级的高低判断标准,是依据民政部针对全国性的基金会进行的不同评级而定义的,评级越高,基金会声誉越高。最后,依照慈善组织会聘请的审计事务所性质,本文将其区分为百强所与非百强所,百强事务所对于慈善组织的监督力度往往会更强。表 6 报告了实证结果,全国性基金会以及聘请百强事务所的基金会所受到的外部监督较为严格,而较高评级的基金会一般具备较为突出的内部治理水平,捐赠者的所发挥的主动治理效应相对更弱。也就是说,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可以替代一部分捐赠者的主动治理效应。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 3。

表 6 主动治理效应的替代作用检验

变量	基金会性质		基金会评级		事务所性质	
	全国 (1)	地方 (2)	高 (3)	低 (4)	百强 (5)	非百强 (6)
Res_{t-1}	1.362 (1.118)	3.372 *** (11.706)	0.695 (1.162)	3.215 *** (7.465)	1.092 (1.619)	2.450 *** (4.712)
Res_{t-1}^2	-0.652 (-0.599)	-3.228 *** (-9.861)	-0.555 (-0.882)	-3.058 *** (-6.134)	-0.374 (-0.499)	-2.215 *** (-3.966)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040 (-0.021)	2.643 *** (6.245)	0.487 (0.611)	1.033* (1.655)	-0.412 (-0.446)	0.049 (0.068)
Obs	918	8 001	1 301	3 287	864	3 108
Adj. R ²	0.445	0.319	0.535	0.417	0.612	0.407
Res_{t-1}/Res_{t-1}^2 系数组间 差异 P 值	1.914 *** / -2.481 ***		2.507 *** / -2.486 ***		1.170 ** / -1.665 **	

注:括号内的为 t 值;*、** 和 *** 分别表示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异质性分析的系数组间差异检验的 P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1 000 次)计算得到。

五、内生性检验

为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慈善组织所在地的储蓄率作为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认为,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捐赠者对于资产使用的谨慎程度与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因此,也会与其采用主动治理来约束慈善组织对于其所提供的慈善资源的行为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但与慈善组织的未来捐赠收入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表 7 第(1)列~第(2)列的结果显示, $Reservation_{t-1}$ 、 $Reservation_{t-1}^2$ 分别与 Res_{t-1} 、 Res_{t-1}^2 在 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 7 第(3)列的检验结果显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 7 工具变量检验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Res_{t-1}	(2) Res_{t-1}^2	(3) $Donations_t$
$Reservation_{t-1}$	0.144 *** (4.487)	-	-
$Reservation_{t-1}^2$	-	0.057 *** (3.299)	-
Res_{t-1}	-	-	28.465 *** (3.481)
Res_{t-1}^2	-	-	-30.374 *** (-2.586)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652 *** (-7.571)	-0.419 *** (-5.292)	4.960 *** (6.280)
Obs	7 400	7 400	7 400
Adj. R ²	0.121	0.086	-0.493

注:括号内的为 t 值;*** 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2011 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我国慈善组织的监管部门发布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以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从捐赠者角度出发,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社会关注度的增强,导致捐赠者对捐赠资产的使用情况的敏感性提升,捐赠者对捐赠资产的使用和时间范围加以限制,同时更加关注慈善组织的外部监管和信息披露情况。如表 8 所示,为排除当年事件的直接影响,本文剔除了 2011 年当年的数据后再次进行了主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相对于未剔除 2011 年当年数据之前的结果,主动治理程度对未来捐赠收入的影响更加显著,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也更加明显。

表 8 排除“郭美美事件”的影响

变量	剔除 2011 年当年数据的主回归检验		剔除 2011 年当年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	
	(1)	(2)	(3)	(4)
Res_{t-1}	0.946 *** (6.513)	6.396 *** (13.060)	1.718 *** (2.371)	6.373 *** (2.772)
Res_{t-1}^2	-	-6.049 *** (-11.237)	-	-12.079 *** (-2.750)
FTI_t	-	-	-15.526 (-1.543)	-14.689 *** (-1.485)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4.356 *** (-6.478)	-3.483 *** (-5.125)	73.924 (1.561)	70.495 (1.513)
Obs	10 287	10 287	291	291
Adj. R ²	0.179	0.191	0.258	0.265

注:括号内的为 t 值;*** 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六、稳健性研究

(一) 按基金会规模大小分组回归

慈善组织的规模反映了其履行受托责任和筹

资能力。一方面,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大,其影响力也随之增强,更容易吸引媒体、社会公众和监管部门的关注,但也可能引入更多的监管干预。另一方面,组织规模越大,利益相关者与组织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也越高。因此,大型慈善组织更倾向于与捐赠者进行信息披露和沟通,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同时塑造组织的社会形象和提高公信力。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慈善组织在成本分配和财务报表编制等方面可能缺乏专业知识,因此不太可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表9的第(1)列~第(4)列分别表示按基金会规模大小分组进行线性和二次回归的结果。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慈善组织规模越大,越不容易受到缺乏财务灵活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小型慈善组织存在的管理上的约束更大,吸收机构捐赠收入较多的小型慈善组织和该基金会的潜在捐赠者,需要考虑财务灵活性对基金会带来的影响。

表9 按基金会规模大小分组回归

变量	大型基金会		小型基金会	
	(1)	(2)	(3)	(4)
Res_{t-1}	0.918 *** (4.511)	6.742 *** (10.657)	0.886 *** (4.746)	6.874 *** (10.269)
Res_{t-1}^2	—	-6.543 *** (-9.259)	—	-6.581 *** (-9.051)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4.479 *** (-3.948)	-4.391 * (-3.946)	3.650 *** (2.359)	6.200 *** (3.907)
Obs	6 127	6 127	5 713	5 713
Adj. R^2	0.154	0.172	0.061	0.073
Res_{t-1}/Res_{t-1}^2 系数组间差异 P 值	-0.515 *** / -0.681 *			

注:括号内的为 t 值; * 和 *** 分别表示在 $p < 0.1$ 、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异质性分析的系数组间差异检验的 P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1 000 次)计算得到。

(二) 划分来自个人与来自机构的捐赠收入

个人捐赠者和机构捐赠者在获取及分析慈善组织财务信息的能力和动机方面有所不同。个人捐赠者一般比较注重社会福利程度,而机构捐赠者比较注重自身社会价值的提升。表10的Panel A结果表明,来自个人捐赠者的捐赠收入稳定性更强,有利于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表10的Panel B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质量在主动治理程度与未来个人捐赠收入的影响机制中没有起到中介作用,

在主动治理程度与未来机构捐赠收入中仍然发挥着中介效应。个人捐赠者可能缺乏获取财务信息方面的动机,获取信息的途径也相对较少,而机构捐赠者捐赠前会对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分析。

表10 划分来自个人与来自机构的捐赠收入

Panel A 主回归分析				
变量	来自个人		来自机构	
	(1)	(2)	(3)	(4)
Res_{t-1}	1.047 *** (4.140)	7.979 (8.456)	1.193 *** (4.650)	9.475 *** (9.783)
Res_{t-1}^2	—	-7.702 *** (-7.725)	—	-1.901 *** (-5.385)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11.471 *** (-8.371)	-11.335 *** (-8.356)	-5.937 *** (-4.778)	-5.775 *** (-4.691)
Obs	11 269	11 269	11 270	11 270
Adj. R^2	0.167	0.167	0.425	0.430
Panel B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来自个人	来自机构		
	(1)	(2)	(3)	
Res_{t-1}	2.052 *** (5.919)	1.788 *** (3.599)	4.199 ** (2.540)	
Res_{t-1}^2	—	—	-4.455 (-1.529)	
FTI_t	0.292 (1.477)	0.784 *** (5.342)	-0.748 *** (5.016)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10.059 *** (7.525)	9.388 *** (10.240)	9.548 *** (10.369)	
Obs	407	330	330	
Adj. R^2	0.218	0.368	0.370	

注:根据Panel A对 Res_{t-1} 求偏导后,将中介效应检验中 Res_{t-1} 的范围设定为(0, 64.47%)。由于Panel B中介效应检验第二步和表5模型和回归结果均保持一致,此处略。括号内的为 t 值; ** 和 *** 分别表示在 $p < 0.05$ 、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三) 捐赠者主动治理与慈善组织失信

前文假说认为捐赠者对捐赠资产的使用施加限制主要是出于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为了证明该假设成立,该检验从民政部官网、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整理出了2015—2020年慈善组织失信和行政处罚数据,设置虚拟变量 $Conf_t$ 。以基金会失信或受到行政处罚的年份为界限,失信或者受到行政处罚前为0,失信或者受到行政处罚后(含当年)为1。参考陈丽红等^[3]的模型,此模型提供了在经典捐赠理论上建立的捐赠决策方法。解释捐赠者进行主动治理是否是由慈善组织失信或者受到行政处罚所致,模型与实证结果如模型(6)和表11所示。

$$Res_t = \alpha_0 + \alpha_1 Conf_t + \alpha_2 FR_{t-1} + \alpha_3 Prog_{t-1} + \alpha_4 Fundrasing_{t-1} + \alpha_5 Concentration_{t-1} + \alpha_6 Age_t + \alpha_7 off + \alpha_8 Ind + \alpha_9 Area + \alpha_{10} Gender_t + \alpha_{11} Personage_t + \varepsilon_t \quad (6)$$

表 11 捐赠者主动治理与慈善组织失信

变量	Res _t
Conf _t	0.308 *** (2.930)
Gov _{t-1}	0.013 (0.685)
Control	控制
_Cons	-1.286 (-1.296)
Obs	41
Adj. R ²	0.360

注: 括号内的为 t 值; *** 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表 11 的实证结果表明, Conf_t 与 Res_t 在 0.0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意味着慈善组织在失信或者受到行政处罚后, 慈善组织受到的捐赠资产限制会更多, 即捐赠者的主动治理程度更强, 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即捐赠者主要是出于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而对捐赠资产施加限制。

(四) 其他方法验证非线性模型

Tosi 等^[14]使用的对数变换的解释力与二次模型相同。表 12 中的结果与前文二次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 再次验证了本文的模型。

表 12 其他方法验证非线性模型

变量	Donations _t
ln(Res _{t-1} + 1)	1.461 *** (7.557)
Control	控制
_Cons	-3.484 *** (-0.811)
Obs	11 840
Adj. R ²	0.171

注: 括号内的为 t 值; *** 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五) 拓展分析

面对捐赠者的主动治理, 慈善组织可能也会“迎合”其主动治理偏好。为检验捐赠者最偏好哪一类慈善组织公益项目特征, 以便更好的理解其主动治理行为, 本文参考李维安等^[15]的做法, 此模型创造性的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 使用了济贫程度(Project_1)、社会福利程度(Project_2) 和捐赠者自身社会价值(Project_3) 来进行捐赠者行为决策分析, 模型和实证结果为:

$$Donations_t = \alpha_0 + \alpha_1 Project_x_t + \alpha_2 Concentration_{t-1} + \alpha_3 Size_t + \alpha_4 Age_t + \alpha_5 off + \alpha_6 Ind + \alpha_7 Area + \alpha_8 Nature + \varepsilon_t \quad (7)$$

其中: X = 1 2 3。

从表 13 的结果可以看出, 慈善组织公益项目特征对捐赠者的捐赠决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捐赠者的偏好有关社会福利程度(Project_2) 和可以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Project_3) 的公益项目, 均在 0.01 的水平下与慈善组织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 表明公益项目惠及人口数量越多、公益项目中捐赠者自身价值越高, 就越容易获得更多的限定性捐赠。

表 13 主动治理偏好与慈善组织捐赠收入

变量	Donations _t		
	(1)	(2)	(3)
Project_1	0.334 (1.424)	-	-
Project_2	-	0.791 *** (5.046)	-
Project_3	-	-	0.278 *** (5.961)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13.864 *** (55.583)	13.903 *** (56.155)	13.389 *** (24.773)
Obs	1 488	1 491	969
Adj. R ²	0.311	0.322	0.258

注: 括号内的为 t 值; *** 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六、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捐赠者的主动治理行为能够发挥治理效果, 其与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呈现倒 U 型关系。即在一定的捐赠者主动治理程度下, 限定性净资产比例越高, 未来捐赠收入越多; 当主动治理程度超过该范围, 限定性净资产比例越高, 未来捐赠收入反而减少。中介检验的结果显示, 捐赠者通过提升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发挥治理效应。后续的分类检验发现, 捐赠者主动治理程度与未来个人捐赠正相关, 信息披露质量不发挥中介作用。捐赠者主动治理程度与未来机构捐赠收入仍然存在倒 U 型关系, 信息披露质量发挥中介效应。本文的结论提供了捐赠者主动治理的实证证据, 也为慈善组织的良性治理提供了新的

思路。作为一个凝聚社会公信力,多方参与的现代化社会性组织,慈善组织对于推动和谐善治、构建社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也更需要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现状,实现多方共治。

(二) 政策建议

第一,打造阳光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保障慈善资源有效配置和使用。在信息不对称影响下,中国慈善市场存在结构性失衡,慈善捐赠者困境等严重阻碍了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通过打造阳光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多方参与的监管监督体系,能够促进慈善资源“物尽其用”,提升慈善组织运行效率。

第二,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慈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借助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方法,通过数字工具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和效益,以此提高慈善组织透明度与信任。应用智能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来改进慈善项目的管理和监控。上述自动化流程可以提高效率,减少行政开支,使更多的资源用于慈善使命。

第三,完善慈善组织与慈善项目的相关评估机制。我国的相关评估机制仍旧存在指标单一、依赖经验主义等问题。通过完善针对慈善组织与慈善项目的评估机制,加强对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等方面的考察,以及对慈善项目的过程、绩效考核,能够有效推动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可持续发展。

第四,加强对慈善组织相关从业人员的社会伦理道德引导。缺乏健康的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支撑的第三次分配难以在促进社会公平中有所作为。建立专业培训和教育计划,进一步促进知识共享和网络建设。同时建立绩效评估和奖励机制,并加强政府和协会监管和监督,强调伦理教育。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慈善从业人员的素质,确保他们遵守伦理道德标准,并提高慈善事业的效益。

参考文献:

- [1]王正位,王新程.信任与捐赠:社会网络在捐赠型众筹中的认证作用[J].管理世界,2021,37(3):34-50,4-7.
- [2]陈世柏,李云.海外乡亲捐赠医疗卫生事业的功效与问题:广州案例[J].中国软科学,2020(6):77-84,111.
- [3]陈丽红,张龙平.慈善基金会特征、审计师选择与捐赠决策[J].审计研究,2014(5):68-76.
- [4]刘祖基,孙淑伟,胡浔,等.社会化慈善基金会与会计信息质量[J].会计研究,2020(7):38-48.
- [5]张雪,李婧.“随缘”募捐机制如何影响个人捐款行为:基于线上实验的证据[J].中国软科学,2022(9):64-73.
- [6]沈弋,吕明晗,朱佳立,等.慈善捐赠、管理者乐观预期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动态认知偏差视角[J/OL].管理工程学报,2023:1-13.
- [7] HUNG, C. Restricted revenues and nonprofit service delivery: the Roles of Financial Discretion [J].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21, 32(1): 136-150.
- [8] SURYSEKAR K, TURNER E H, WHEATLEY C M.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onor-imposed financial inflexibility and future dona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2014, 27(1): 63-79.
- [9] CONWAY M. Donor intent, disaster relief, education, and policy [J]. Touro law review, 2019(35): 917.
- [10]龙朝晖,谢荣昌.我国基金会财税政策效应研究[J].财政研究,2013(12):22-26.
- [11]胥玲,王冬婷.我国公益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完善研究:基于华为无形资产捐赠案例的分析[J].财政科学,2021,72(12):109-116.
- [12]刘新燕,张惠天,王璐.“悲”天悯人,还是“乐”善好施:受助者困境态度效价与心理距离对捐赠意愿的交互影响[J].南开管理评论,2023,26(2):48-60.
- [13]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 [14] TOSI H L, GOMEZ-MEJIA L R. CEO compensation monitor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37(4): 1002-1016.
- [15]李维安,姜广省,卢建词.捐赠者会在意慈善组织的公益项目吗: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4):49-61.

(本文责编:辛城)